

武汉

文史资料

亲历 亲见 亲闻

大型文史月刊

WUHAN WENSHI ZILIAO 总第78期 199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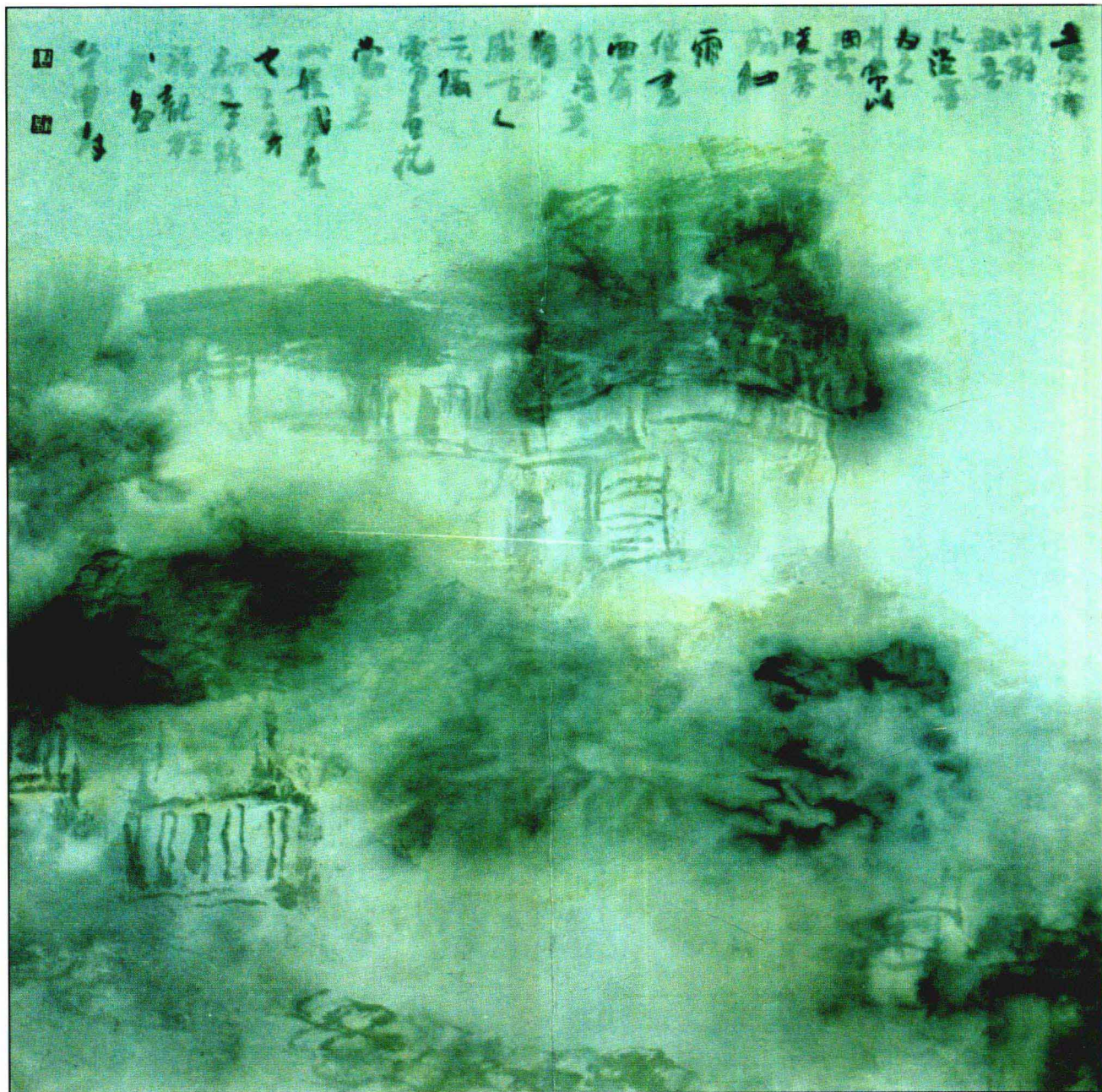
刘彩木：武汉市统一战线工作五十年

刘作忠：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汪列九：侧记中华民国第一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施裕文：北伐和抗日著名战将黄琪翔

黄 铨：黄申芎的传奇革命生涯



《乡恋余歌》

作者：吕绍福

吕绍福，1950年生于武汉，祖籍安徽旌德。现为湖北美术学院专业画家，出版有《吕绍福集》。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1999年第4期

总第78期

主 编:周志华

副主编:易 涛

编 辑:吴义隆

徐双明

美术编辑:李 炜

校 对:冯 明

发 行:郑汉华

范 力

本刊专稿

□ 4 武汉市统一战线工作五十年

刘彩木

历史风云

□ 9 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刘作忠

民国人物

□ 14 侧记中华民国第一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汪烈九

人物春秋

□ 20 北伐和抗日著名战将黄琪翔

施裕文

□ 24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黄申芴的传奇革命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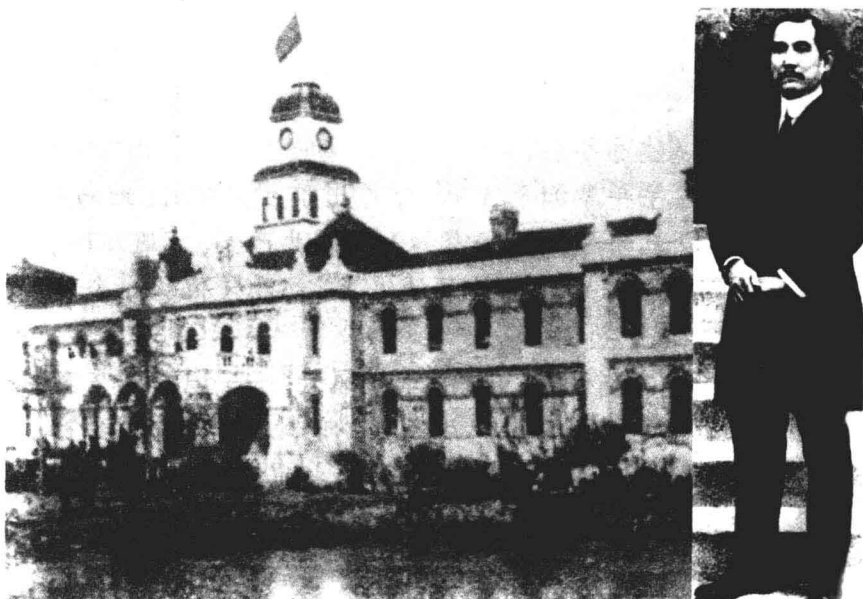
黄 铨

文史论坛

□ 32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

一文的不同意见

涂苏中



历史文物

□ 33 “九省通衢”再现“辛亥风云”

——访收藏辛亥革命文物第一人沈汉生

裴高才

音乐舞台

□ 39 第一个登上世界萨克斯舞台的中国人——杨谊

李炳寅

人生旅途

□ 41 蒋纬国与原配夫人石静宜的不了情

王腊成

宗教世界

□ 43 蜚声国际的佛学家陈健民

陈浩望

史海随笔

□ 47 楹联画像,陶希圣原形毕露

许恺景

历史掌故

□ 48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伏法记

高士振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2007

82837167

邮编:430017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通信指挥学院印刷厂

刊号: $\frac{\text{ISSN}1004-1737}{\text{CN}42-1056/\text{K}}$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定价:4.00 元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

统一战线，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独特作用。在《武汉市统一战线工作五十年》一文中，回顾了本市统一战线 50 年的光辉历程，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于开拓未来，开创跨世纪统战工作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80 周年。“五四运动”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伟大旗帜，以其浩大的气势，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崭新一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策纵先生历时数年，在占有翔实资料的基础上，于 1960 年以英文出版了 55 万字的卓越著作《五四运动史》。此书立即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美国一些大、中学争相节选此书作为学生教材；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再版 7 次；意大利等国家和台湾、香港先后出版了译本……。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几位研究员将此书译成中文，于 1996 年 12 月出版。这对于今天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将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侧记中华民国第一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记叙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情感经历。他始终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革命事业摆在第一位，把个人的情感摆在第二位。他成为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成为中国历史上“黄帝以来无其匹；孔子而后第一人”，因而受到国人尊敬，世人景仰。

《北伐和抗日著名战将黄琪翔》记叙了黄琪翔将军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的赫赫战功。后来，黄琪翔对蒋介石的幻想终于破灭，毅然摆脱了国民党的控制，从香港携眷北上，回到北平，决心归附人民，他积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了人生崭新的一页。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黄申芑传奇革命生涯》，记叙了黄申芑烈士光辉的革命历程：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继而参加二次革命和护国护法，抗击北洋军阀；三十年代初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不避艰险，长期从事情报工作，为抗日救国作出了贡献。由于他执著的追求，终于使他从一个爱国的民主革命者而成长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

《“九省通衢”再现“辛亥风云”——记收藏辛亥革命文物第一人沈汉生》，记叙了工人出身的收藏家沈汉生孜孜不倦地搜集、收藏辛亥革命文物的动人事迹。他克服了自己既缺文化、更缺资金的困难，把寻求、收藏辛亥革命文物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最大快乐，为再现辛亥革命风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他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武汉文史资料

(月刊·每月8日出版)

1999年第4期

总第78期

主 编:周志华

副主编:易 涛

编 辑:吴义隆

徐双明

美术编辑:李 炜

校 对:冯 明

发 行:郑汉华

范 力

本刊专稿

□ 4 武汉市统一战线工作五十年

刘彩木

历史风云

□ 9 周策纵和《五四运动史》

刘作忠

民国人物

□ 14 侧记中华民国第一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汪烈九

人物春秋

□ 20 北伐和抗日著名战将黄琪翔

施裕文

□ 24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黄申芎的传奇革命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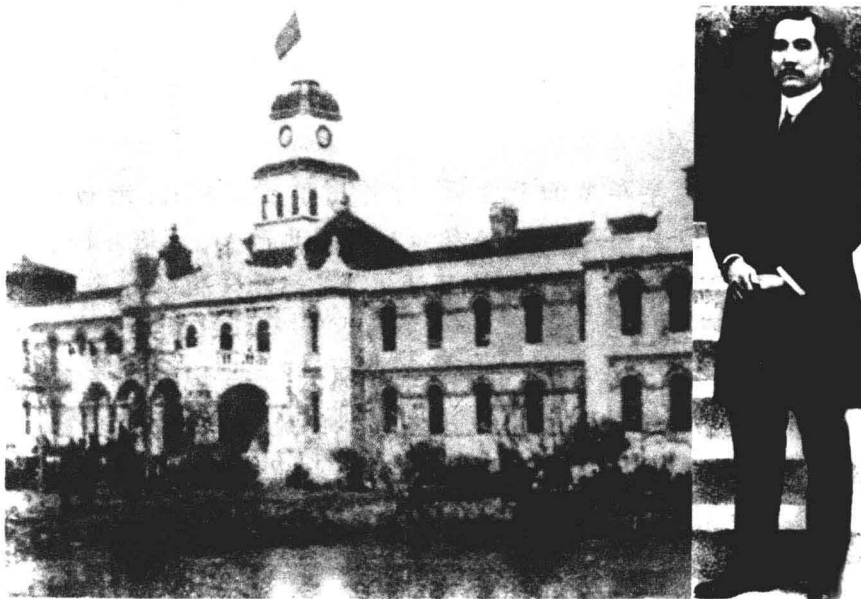
黄 铨

文史论坛

□ 32 对《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围剿”是五次还是六次》

一文的不同意见

涂苏中



历史文物

□ 33 “九省通衢”再现“辛亥风云”

——访收藏辛亥革命文物第一人沈汉生

裴高才

音乐舞台

□ 39 第一个登上世界萨克斯舞台的中国人——杨谊

李炳寅

人生旅途

□ 41 蒋纬国与原配夫人石静宜的不了情

王腊成

宗教世界

□ 43 蜚声国际的佛学家陈健民

陈浩望

史海随笔

□ 47 楹联画像,陶希圣原形毕露

许恺景

历史掌故

□ 48 中国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伏法记

高士振



主办:武汉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102 号

电话:(027)82832007

82837167

邮编:430017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 146 号

印刷:通信指挥学院印刷厂

刊号: $\frac{\text{ISSN}1004-1737}{\text{CN}42-1056/\text{K}}$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定价:4.00 元



武汉市统一战线

工作五十年

□ 刘彩木

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被毛泽东同志誉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作为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不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也发挥了独特作用。今年是建国 50 周年，我市统一战线也将走过半个世纪。回顾我市统一战线 50 年的光辉历程，总结经验，对于开拓未来，开创跨世纪统战工作的新局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我市的统一战线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全方位地开展工作，是在 1950 年 3 月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正式建立起来以后。建国伊始，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是恢复社会秩序、巩固政权和建立

新的社会经济制度。统一战线也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开展活动。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同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交谈时，就对“民主”推崇有加，认为它是我党掌握政权后摆脱历史周期率的最好办法。建国以后，如何使民主真正得以实现？就是不能搞一党专政，要搞多党合作。对于解放不久的武汉来说，要实行多党合作，首先必须帮助建立市级各民主党派组织，市委统战部很快将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从 1951 年 8 月，中国民主促进会武汉市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员会、九三学社武汉市委员会等 6 个民主党派市委先后成立，从而为我市的多党合作打开了局面，奠定了基础。各民主党派市委成立时，成员仅 2229 人，经过市委统战部和各民主党派的努力，至“文革”初期，民主党派成员发展到 3159

人。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我们协助市委、市政府先后安排大批民主党派成员在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任职。据统计，从武汉解放到“文革”初期，民主党派成员先后有 20 人担任市政协副主席，4 人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先后有 42 人次被安排为副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这些人广泛分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最少时涉及市政府 11 个机构，最多时涉及 19 个机构。每届市政府都安排有党外副市长，其中最多的一次（第三届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共安排了 4 位党外副市长。这段时期安排党外人士数量多，层次高，范围广，充分体现了我党的大团结、大联合政策。这些党外人士充分利用党和政府给予的权力和阵地，参政议政，献计献策，并团结各自联系的对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建国初期，我市统一战线要

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协助市委、市政府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它们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武汉解放初期,全市共有民族资本工商业 18608 户,大型户少,中小型户多,分布于商业饮食、运输、金融等各个行业,情况复杂。针对民族工商业的具体情况,市委统战部协助市委、市政府采取以下方法帮助进行改造:一是稳住现有工商业户,不让他们外流,在此基础上,动员已去香港的资本家回汉;二是采取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的方法,先从基础好、影响大的工商企业开始,逐步全面推开;三是充分发挥工商联的作用,因为工商联的领导大都是原工商业者,由他们出面做工作,容易为工商业者所接受。由于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市委统战部和工商联组织严密,操作有序,武汉市的对资改造于 1956 年顺利完成。

建国初期,我市的民族宗教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民族工作方面,全市各级政府坚决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民族政策,全市各少数民族受到党和政府的尊重、关怀和扶持,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生活水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得到了极大的提高。1951 年,武汉市已经确认的少数民族仅有回、蒙古、满、藏、苗 5 个民族。经过各级统战部门的努力,先后发现了 20 多个民族,到“文革”初期,全市少数民族达到了 29 个。解放前,少数民族成人文盲占其人口总数的 80% 以上,建国后,经过党和政府系统组织扫盲学习,到 1956 年时,成人文盲数仅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39.2%,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大大提高。解放前,少数民族就业率低,经常

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建国后,党和政府充分安排少数民族就业,到 1958 年时,少数民族就业率超过解放前夕的 2.5 倍,少数民族的工作权利得到充分保证。在宗教工作方面,武汉地区的各种宗教适应社会制度的变革,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废除了封建特权和压迫剥削制度,摆脱了反动阶级的控制和利用,改变了过去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实现了自食其力。天主教、基督教通过反帝爱国、三自(即自治、自养、自传)爱国运动,割断了同帝国主义的一切联系,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宗教败类,把教会真正办成了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1958 年,武汉天主教在全国率先自选自圣了中国籍主教。现有的这 5 个宗教,都通过信教群众代表会的选举,成立了各自的爱国宗教团体,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信教群众的纽带和桥梁。各宗教团体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除了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外,还逐渐引导宗教信仰徒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贡献。

“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对市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带来冲击,统战工作受到影响,统一战线事业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二)

改革开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春天,也给武汉市的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了希望。在市委的领导下,市委统战部团结全市广大统战干部,鼓舞斗志,振奋精神,紧紧围绕经济建设中心开展工作,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全省乃至全国都享有较高声誉。

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方面,统战工作较之过去有了巨大进步,合作的对象增多了,合作的形式和渠道拓宽了。据统计,1978 年各民主党派开始恢复活动时,成员仅 2563 人(含省属单位成员)。在各级党委和统战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按照“三个为主”(重点分工为主、中上层人士为主、大中城市为主)和“从工作中发展,发展是为了工作”的精神,各民主党派积极发展成员,到 1998 年底,全市民主党派成员人数上升到 7124 人。在帮助民主党派发展成员的同时,还进一步健全了民主党派组织机构。在中国致公党武汉市委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武汉市委于 1992 年和 1994 年相继成立以后,我国 8 个民主党派在我市都建立了市一级组织。此外,8 个民主党派建有区委会 4 个,区工委 44 个,基层组织 396 个(其中总支 7 个,支部 381 个,小组 8 个),至此,市 8 个民主党派基本形成了体系完备、遍及全市的市、区、基层组织三级组织体系。按照中发(1989)14 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武发(1989)6 号文《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结合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具体制度,具体有 5 项:一是对基本政治制度的学习、宣传教育制度;二是以双月座谈会为主,包括民主协商会、通报会、市委常委过民主生活之前征求党外人士意见、谈心交友、基层民主议事等 6 项具体制度;三是党外人士安排制度;四是健全了民主党派在人

大、政府、政协等工作领域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的制度；五是发展了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的制度，如举荐和劝留制度。改革开放20年来，我市各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为经济建设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辛勤劳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如，原市民建主委李崇淮提出的关于我市“两通起飞”、市民革主委单大年提出的《关于发展民营高科技产业》、市民建主委辜胜阻提出的《搞活国有企业应从并购入手》等建议，不仅对我市的经济建设有启迪和促进作用，对全国的经济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一国两制”方针确立以后，对台工作成了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武汉作为全国特大城市之一，对台工作抓得早，抓得实，抓得稳，也抓出了成效。具体做了以下工作：一是促进两岸交往，增进了解，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据统计，截止1998年底，全市共接待来汉台胞51.0666万人次；我市因私赴台的有3504人次；因公赴台的团队有47批271人，其中副市级干部7人，正、副局级干部48人；来汉定居台胞168人；我市有144位台胞赴岛定居；接待台湾团队120批1536人，台胞、台属出境会亲416人，接待台湾上层人士及其亲属369人，全市涉台婚姻近600对。通过交往，双方加深了感情，增进了友谊。二是积极招商引资，为武汉的经济建设服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引进台资企业工作从零起步，发展迅猛。截止1998年底，共引进台资企业543家，投资总额9.13亿美元。在引资中，台湾的大企业有14家在我市落户，投资3.4亿美元；协助东西湖区创办了吴家山台商投资区，发展势头

良好。三是加强了对内对外的宣传工作。由于过去两岸长期隔绝，特别是台湾当局长期的反共仇共宣传，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知之甚少，讳莫如深。加强对台宣传工作力度，对于两岸彼此熟悉十分有益。我们先后在台湾《世界论坛报》等报刊上辟8期专版，系统介绍武汉方方面面情况；接待台湾记者62人，采访武汉多条新闻专稿、纪录片，在台湾进行宣传。与此同时，我们录制台情片3200小时，提供给市、区县委常委和对台工作小组成员看，对机关、学校、团体、企事业单位宣讲对台工作方针政策、台情等500余场。此外，还通过发动全市10多万台属广泛开展“四个一”活动（即给台湾亲人打一个电话，写一封信，引进一个投资项目，邀请在台亲人回乡探一次亲）进一步加强了汉台联系，增加了解，促进汉台交往向更宽广的方向发展。

个体、私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有益补充，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转轨，不断发展壮大。我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步伐与党和政府关于个体、私营经济的政策日臻完善、密切相关。1992年前发展缓慢；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后，个体、私营经济步入发展的快车道；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呈现质的飞跃。据统计，1988年全市私营企业仅300多户，从业人员4500多人，注册资金1916万元；到1998年底全市私营企业发展到16820户，从业人员186832人，产值营业额104.42亿元。1978年末，全市个体工商户不足千户，从业人员千余人，注册资金200万元；到1998年底，个体工

商户累计注册159091人，从业人员408384人，产值营业额203.18亿元。目前，全市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在100万元以上的有3568户，其中注册资本在500万元以上的有475家，1000万元以上的有300户，其中12家企业的资本已超过亿元。全市共有82家私营集团公司，私营控股的股份公司有180家。私营企业在扩张规模、壮大实力的同时，不忘回报社会。1998年个体私营企业共完成税收6.6103亿元，比上年增长17.2%，占全市“两税”总收入的7.2%；完成地方工商税2.3106亿元，占全市工商税收总数的8.2%。1998年，全市有45家私营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等形式，对49家国有集体企业进行改组、改造，消化了近3亿元债务，安置1.4万国有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还积极投身扶贫的“光彩事业”，现已有100多名民营企业企业家投资近3个亿，兴建了70多个光彩事业项目。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为社会提供就业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共吸纳下岗职工8万人再就业。为了肯定私营企业为我市经济建设作出的贡献，年初，市里召开表彰会，对全市66个“光彩之星”企业、102个明星企业、101位优秀私营企业家进行了表彰。

民族宗教工作是关系我市社会稳定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在对民族宗教界中的冤假错案（如“隐藏在真耶稣教会的反革命集团案”）进行甄别平反的基础上，认真贯彻执行党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民族宗教的法规，加强对宗教及宗教事务的管理和指导；依法打击了“观音法门”、“福音团契”等邪教组织活动点；组织宗教界人士先后出访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加强了武



汉与各国的交流与联系；发动宗教界人士为社会公益事业引进资金一千多万元，为1998年抗洪救灾捐款120余万元。目前，全市拥有宗教教职人员约1000人，信教群众11余万人，已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300余处。我们在全市44个少数民族近5万群众中落实了政策，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帮助少数民族乡村和民族街道发展经济，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推动少数民族全面进步。1995年还出台了《武汉市实施〈城市民族工作条例〉的办法》，使少数民族工作走上了法制轨道。市民委、市宗教局还分别受到国务院的表彰。

党外知识分子是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对象，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是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统一战线的重要任务。自1988年以来，我们以武汉知识分子联谊会为中心，做了大量工作。一是发动广大会员建言

献策，为党和政府当好参谋。如，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专家许其贞，在全国政协八届三次会议上提出了“对国有企业破产要慎重”的提案，经国家经贸委推荐，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提案奖。二是组织会员，为武汉市的经济建设作贡献。如1996年7月至1997年元月，我们组织知联会有关专家教授为东西湖区的经济发展开展了4次咨询服务活动，最后提出了20多条中肯有价值的建议。三是发动知识分子广泛开展“学、爱、作”（即学理论、爱祖国、爱岗位、作贡献）活动。这一活动在全市开展起来后，收到明显成效。武钢是“学、爱、作”活动组织最早，抓得最好的单位，企业从中获得了4.5亿元的经济效益。武汉的“学、爱、作”活动经验受到中央统战部充分肯定并被介绍到全国，影响很大。

长期以来，我们坚持“两个轮子一起转”，在抓统战实际工作的同时，注重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先后召开14次大型统战理论研

讨会，编撰统战理论专著近20部，公开发表论文（调研报告）近600篇，有近百篇文章先后获得中央、省、市有关部门的嘉奖。武汉统战理论研究工作在全省、全国都有较高的知名度。

回顾改革开放20年来我市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成绩，主要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市委的坚强领导。20年来，市委领导不管多忙，总是参加统战部的一些大型活动，亲临指导；对于统战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妥善解决；定期听取统战对象意见，不断吸收并改进工作；市委还先后制发了许多关于统战工作的文件，如，《中共武汉市委关于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决定》等等，对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重视关心统战工作有激励、鼓舞作用。二是市委统战部领导全市广大统战干部立足岗位，围绕中心，奋力开拓。20年来，市委统战部率领全市统战干部紧紧围绕新时期全市

工作中心,做了许多建设性工作,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经济发展。如,在海外统战工作方面,先后成立了武汉海外联谊会 and 武汉欧美同学会,以这两个社团为媒介,不断拓宽海外联谊的范围,加大海外统战工作力度。三是广大统战对象殚精竭虑,与我党真诚合作。20年来,全市60万统战对象充分利用自己的特长,立足本职岗位,勤奋工作,无论是在参政议政、建言献策方面;还是在招商引资、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他们都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发挥了很大作用。四是中央统战部、省委统战部的指导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中央统战部、省委统战部经常指导我部工作,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推动作用;统战工作涉及面广,需要许多部门的支持配合才能做好。如,党外人士的实职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等等,如果没有组织部、工商局、科委、人事局等部门的协助,将会裹足不前,一事无成。

(三)

历史将跨入21世纪。新的世纪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市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会更重,压力会更大。统战工作在新的世纪如何开展?怎样着力?

首先,全市统战干部要继续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导跨世纪的统战工作。邓小平理论是全党全国人民的伟大旗帜,是凝聚广大统一战线成员的强大精神支柱,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新时期统战理论,是全面加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建设,开创跨世纪统战工作新局面的生命和灵魂。各级

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做全市广大统战干部的榜样。要结合本地实际学,要把学习理论与促进本地统战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要使邓小平理论与党的十五大精神始终成为跨世纪统战工作的指路明灯。

其次,要在市委的领导下大力整顿统战干部队伍,提高统战干部素质。提高统战干部的综合素质是做好跨世纪统战工作的关键。统战工作是一项团结人心,凝聚力量的工作,要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到党的周围,为党确立的目标去奋斗。因此,做统战工作的干部,从上到下,必须具有坚强的党性、很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道德修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动摇意志,不丧失信念,一定要对统战干部有这种要求,并不断强化这种要求。统战工作对象面大,范围广,情况复杂,要做好他们的工作,统战干部必须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知识面要宽,反映能力要快,逻辑思维要强。统战工作是一项协调性很强的工作,要求广大统战干部必须有吃苦精神,甘于清贫。

再次,要立足本地实际,大胆创新,不断开创各项工作新局面。在党派工作方面,要继续把加强民主党派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放在重要位置;要下很大力气、花较长时间帮助物色、培养一大批民主党派后备干部,这是关系到多党合作生死存亡的大事。此外,还要继续拓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渠道,加大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力度,使民主党派真正成为全市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非公有制经济工作方面,大力拓展工商联职能,充分发挥它作为党和政府联系非公有制经济的桥梁、纽带作用;要帮助

扶持、培养几个在全国叫得响的企业,扩大在全国的影响;帮助培养一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此外,还要注意培养一批政治上可靠的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物。在海外统战工作方面,要充分发挥“海联会”和“欧美同学会”的作用,在做好现有统战对象工作基础上,将重心逐渐转向汉籍海外留学生,此外,还要做好华侨“新生代”的工作。目前,香港已回归祖国,澳门即将回归祖国,祖国统一只剩下一个台湾问题,要继续加大汉台交往力度,加大对台宣传工作力度,努力做好台湾人民的工作,推进祖国早日和平统一。在民族、宗教工作方面,贯彻落实江总书记关于民族和宗教工作的“三句话”精神;结合城市民族宗教工作的实际,因势利导做好团结、稳定工作;要警惕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势力实施“西化”、“分化”阴谋;防止农村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做好宗教团体领导人的培养、选拔工作;促进民族经济、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在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方面,以“武汉知识分子联谊会”为核心,继续深化“学、爱、作”活动,使之更成规模,更有影响,更具成效;继续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现状的调查,充分了解情况,提出针对性强的建议;努力做好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培养、选拔工作。在统战调研工作方面,不断顺应形势,出新招,出好招,出佳绩。

(作者系武汉市政协副主席、中共武汉市委统战部部长)

谨以此文献给“五四”运动 80 周年

(1919——1999)



周策纵于美国加州阿巴尼市

周策纵 和 《五四运动史》

□ 刘作忠

1952年的一天。美国密西根大学。一位曾在
中国停留多年的名教授正与一位中国留学生
讨论该生的博士论文选题。忽然，教授提高了嗓
门：“什么！你说你要写五四运动，不行！博士论文怎
么可以写学生暴动？……什么？说这是中国的文化运
动、文艺复兴、思想革命？简直胡闹！你若是坚持写这
个题目，我们就取消你的奖学金！”这位中国留学生
愤然而去。几年后，这位留学生顶住多方压力终于完
成论文，接着他将论文扩写成55万字的《五四运动
史》，于1960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此书
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美国一些大、中学争相节选
此书为学生教材；哈佛大学出版社先后再版7次；意
大利、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出版了译本；日本、
英、法、德、加拿大、捷克、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台
湾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报刊，都曾发表专文评述《五
四运动史》，称誉该书为“一本材料详实、内容丰富的
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现代中国的读者不可缺少的
指导性参考书……这书把历史细节和广阔的社会
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织起来，造成一种完美的有解释
性的关于中国的研究，实在是前所未有的。”（美国《东
方学会学报》）；各国研究中国近代史、思想史、文学
史或传记的著作，几乎例必征引《五四运动史》；大英
百科全书再版时特邀《五四运动史》作者补写“五四
运动”条，使中国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成为世界知识
的一部分。

人们不禁要问：《五四运动史》的作者何许人也？

此人姓周名策纵。

多彩的青少年时期

1916年周策纵在湖南祁阳出生之际，中国正面
临巨大的变革：旧的社会尚未完全解体，新思潮、新
观念未能成形。一般学子除了传统思想的熏陶外，也
受到西洋新思潮的感染，新观念不断地产生。周策纵
即在这种中西交并、新旧更迭的夹缝中成长。

周父鹏翥，旧学深厚且思维维新，曾参加同盟会
和辛亥首义。周策纵幼承庭训，4岁时父母及姐姐即
教他唐诗。“我当时不识字，只是跟着念，跟着学腔
调，后来也就读熟了。”6岁时，父亲延请教师教“我
们兄弟读诗经，老师一面读，一面解释，结果念来念
去，我们还是搞不懂。”周策纵9岁时，新式小学开
办，新设历史、地理及数学一类课程，但是文章方面
仍然不出《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等书。到他赴衡
阳念初中时，开始有了转变。“当时的国文老师，虽然
大多还是前清举人，教古典文学。但是有一批毕业于
北京大学的老师，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开始以不同
的论点来解释《论语》、《孟子》，同时鼓励学生们阅读
白话小说。”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反日运动”，
同学们推荐口才好、文笔佳、同时对时事了解较深的
周策纵为学生代表，领导大家开展抗日活动。

周策纵升上长沙第一高级中学后，抗日运动逐

步升级，各地反日情绪日趋高涨，这些给学生们带来新的学习机会。此间，周策纵写下了大量的白话文和新诗。他兴趣广泛，国文、历史、地理、书法，及至自然科学无一不名列前茅。当时，该校主办的校刊《长高学生》四字，就出自周策纵的手笔。

1935年夏秋之际，湖南省主席何键为适应抗战需要，组织本省4000多名高中学生军训，何亲任军训总队长。军训期间，曾举行文艺大赛，设立文艺总奖及散文、诗词、戏剧、小说四个专项奖，各奖银盾及奖状等。结果，19岁的周策纵独揽总奖、诗词奖、戏剧奖3项。他此次获奖的《习战》诗，后来刊载于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印行的《民族诗坛》1939年6月第3卷2期。该刊当时的主编是著名文学家卢前（冀野），取稿水平相当高，经常刊登作品的多为南社社友。周策纵以小小年纪，其诗作能刊于这样的刊物上，其功底由此可见。这首诗全文如下：

偶遭雄心到九边，渭城杨柳玉门烟。
风沙祖述丁艰日，旗鼓周郎习战年。
初拂倦眸看铁垒，最惊举世饮狂泉。
书生摆甲酬家国，北睇燕云一著鞭。

寸寸关河寸寸灰，千年辽鹤应归来。
风尘故剑悲吾党，肝胆交情寄夜台。
九世复仇知大义，一身殉国答涓埃！
华拿不作孟卢死，事业文章几霸才？

家书催我欲还乡，跃马中原忍便忘。
喔喔鸡声辜大将，惛惛归计阻沙场。
剑南诗草从军乐，华北风云动地忙。
夫子亦云微管仲，贾生疏欲挾中行。

敢谓吾谋适不用，伤哉秦国竟无人。
孕残海内魂魂气，哭断天涯的的春。
难起斯民烧爨纬，可能削骨作劳薪？
墨池霖雨苍生望，我佛天亲有等伦。

《和彭雪琴梅花诗八十五首》是周策纵读高中时的又一力作。彭雪琴（玉麟）即清季中兴湖广的四大名将（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之一。彭酷爱梅花，据说其咏梅诗当有千首以上，惜多半散失。后来有人搜集彭的85首咏梅诗辑为一册留传下来，周策纵一一和之，在《长高学生》刊载后，反应颇佳。

高中求学之际，周策纵开始关心自

然和人文方面的重大问题，他先后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有关自然科学和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的论文，包括：《相对论战胜牛顿定律》、《内分泌之重要及其功用》、《论儒、释、道之交互影响》等，每篇都在万字以上。其中《荀子礼乐论发微》于1937年1月连载于当时颇有学术地位、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学术世界》月刊上，后因抗战爆发未刊完，稿件也大半散失了。

高中毕业，周策纵本已考取金陵大学农学院，但是受爱国之心的驱策，他毅然进入中央政治学校（后易名中央政治大学）。比较北大、清华，政校保守多了。但保守的风气并没有束缚住周策纵的视野，课余之外，他仍不断接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新思潮，不时有诗文见诸报刊。内容多牵涉到中西哲学、政治思想、世界史、中国古典诗歌和历史上的社会问题。如《苏格拉底论死》、《近代史上之波兰》、《汉、晋诗歌中所表现的妇女生活及婚姻问题》。在《布丹的主权论》一文后面，周策纵选译了布丹的名著《国家六论》（1576），在《格老秀斯的国家论与主权论》一文后，他选译了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1625）一书。周策纵后来说：“我当时的目的是想要探索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和‘国家主权’观念的根源。在一篇《政治与冲动：罗素政治思想述评之一：政治目的论》里，我介绍并批判了罗素的‘占有冲动’和‘创造冲动’理论。我也有一篇《知·情·意论》，在那里指出中外古今都有一种知、情、意、智、仁、勇、真、善、美或德、智、体的三分法，希望有三者的平衡发展。”

大学期间，周策纵曾用很大的精力研究《左传》中的子产、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周策纵1942年发表的《时空政治》显示出他对时空（四度空间）、选举、任期期限、司法独立和行政效率的极大兴趣。“此外在与人合作的《政治离乱与集权主义的误区》和《水到渠成的均权主义》二文里，我企图解决中央和地方权力分配的难题。”

1942年，周策纵于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毕业，因成绩优秀，留校主编校刊《新认识》（月刊），并指导后期在校同学的写作和文化运动。由于他才华出众，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先生的赏识。陈果夫到校演讲，每由周策纵记

录。

一年后，时任重庆市市长、湘人贺耀组（贵严）经人引荐，邀请周策纵去市政府担任专员、秘书，后来又兼编审室主任。这段时期，贺的许多文章、讲稿和一些重要提案，多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周策纵学识渊博，又吃苦耐劳，贺耀组十分赏识，连一些对外活动和重要会议也委托周策纵代他参加或主持。能者多劳，周策纵此间还兼任过重庆市政府主办的《市政月刊》总编辑、重庆市行政学院的教育长。一个大学才毕业的青年，委以如此众多的重任，可谓破例又破格了。

抗战胜利之初，屯兵新疆的宋希濂函电邀请周策纵前往担任其部少将政治部主任，且任命书已寄到，但此时陈果夫、陈布雷、肖自诚、曹圣芬等已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秘书）。周策纵只好辞谢了宋的盛情，前往侍从室为蒋介石写讲稿、新闻发布和宾客接见记录等事宜。连续两三年，周策纵与陈布雷、徐复观、陶希圣等出入于重庆曾家岩和南京黄埔路的“主席官邸”，他因此接触了许多高层人物，也了解到不少内幕。蒋介石当时的一些重要文稿不少出自周策纵的手笔，如台湾“二·二八”事变的《告台湾同胞书》就是由周执笔的。

回想那段仕途，周先生细说当年：“我跟蒋先生做秘书工作，有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泽东、周恩来、李宗仁、马歇尔等等。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我就在场。有机会接触这些人物，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的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

“亡命者”“去国”

身居“最高官邸”的周策纵以自己的才华和恪尽职守的精神，赢得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赞扬，可谓“春风得意”，前途无量。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走上辞职自费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呢？请听他后来的回忆：“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派系如何纷争，党派何等瘫痪（我指

的不只一个时代、一个政党)；我如果继续工作下去，对国事决不会有太大的补救；自己的个性，也与官场不合。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因此，‘实迷途其未远’，我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考取自费留学，就决意辞职出国。起初辞职不准，后来我再三坚持，并推荐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同学的唐振楚学长接替，一年以后才成行。”

周策纵要辞职出国留学，各方反应不一，“果夫先生对我责备颇严厉，布雷先生却担心我的生活。”与周策纵亦师亦友的顾颉刚先生却手书《世说新语》一则为周送行，全文是“支公好鹤，往剡东岬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锻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策纵先生将渡重洋，譬如鹤之翔乎寥廓，广大之天地皆其轩翥之所及也。因书《世说》此节，以壮其行。三十七年三月顾颉刚书于白门。”

周策纵对顾先生的好意铭感不忘，这幅墨宝他一直珍藏，并收入他后来主编的《民初书法》一书中。

1948年5月，32岁的周策纵怀着非常复杂的心情，在上海公和祥码头登上“美琪”号邮轮。海轮西去，波涛滚滚，周策纵心潮逐浪高，他喃喃吟出一首《去国》诗来：

万维疮痍欲语谁，却携红泪赴洋西。
辞官久作支床石，去国终成失乳儿。
说议从违牛李外，史心平实马班知。
吴门倾侧难悬眼，碧海青天憾岂疑。

自注云：“陈布雷先生临别于私室赠言，以予湘人，殆有曾文正公自立事业之志，故不可强留。因忆文正《漫兴》诗有云：‘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信予情之更切于曾也。1948年5月10日于美琪轮上。”

周策纵于1957年所写，后刊登于台北《自由中国》的那首《给亡命者》的诗，很能代表他当年执意辞职出国留学的决心和心境，现节录数段如下：“有风云就有你的脚印/却没有罗盘能找到你的方向/你卖剑在长安的十字街头/你题诗在浔阳江酒楼的壁上/虽然抛

弃了名马和爱人/却昂头渡过了绝望的乌江/用白眼看汉宫里乌压压的臣妾们/三呼万岁声中股票俯伏的可怜相/你风险的生命永远被画影图形/头颅不合皇冠只合悬着赏金/大黑披风内阴深得非短剑所能测/偶然冷笑而起使四座失色/与威权不共戴天/让太阳对你发抖/永远给威胁以埋伏的威胁/逼暴君的车驾慌忙爬过桥头。”

浮海著禁书

尽管身在异国，但周策纵的爱国、报国之心未泯。他最关心的是中国如何富强，如何吸收西洋的长处，推动现代化。他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写《五四运动史》。周先生向我侃侃谈起他研究“五四”运动的动机：

身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历史及政治转变，对近代的变局应有一通盘了解。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

1931年沈阳事变，我正在读初中，曾与学生代表一起演讲，抵抗日本侵略。后来到长沙读的高中，即是毛泽东15年前毕业离开了的同一校址（即长沙高级中学）。在当时的学生运动中，我颇为活跃，也是学潮和罢课活动的核心人物。当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自然感到骄傲和敬佩。那时我已写过上千首旧体诗，可堪注意的是：我第一首白话诗，题目就是《五四，我们对得住你了》，这首诗曾在郭沫若和田汉合办的《抗战日报》上发表。1947年5月4日，我在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第一篇研究“五四”的文章——《依旧装，评新制：论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特征》，同一天还登载有胡适先生、该报主笔王芸生先生和中国农工党领导人董时进纪念五四的文章。那个时候，我就梦想有一天能写一本有关“五四”运动的书。可惜我那篇文章已非常含蓄，未能尽意，却已引起当局对我的警告，这反更增加了我要写这么一本书的意愿。

赴美之后，研究环境十分困难，西洋学者和图书馆多不知道或不注意有

“五四”运动这回事，所以海外搜集资料非常缺乏，或未加编目；而当时复印机又尚未发明，引用资料都要凭个人手抄。我把1915—1923年间的报刊，直接间接、多多少少检阅过六七百种。

周先生还向我谈及著述《五四运动史》的宗旨：

“五四”时期，人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尤其是政治党派的立场和人生观，变动得特别快速和突兀，连他们自己也非初料所及；加上“五四”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和后来各党派的不同解释，更使亲身参与者、所见者、所闻者、所传闻者，前后的回忆往往自相矛盾，或加油加醋，畸轻畸重；或无中生有；或抹煞事实；或夸张减料，抹黑抹红，几乎无所不有。有鉴于此，我决定大量采用当时人的谈话记录，透过这些原始材料，让当时的人和事自己替自己说话。

我深恶当代史家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1960年，55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了。在《导言》中，周先生首先将“五四”运动定为“有世界意义的事件”，称其为“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新思潮、文学革命、学生运动、工商界的罢市罢工、抵制日货以及新式知识分子的种种社会和政治活动。”而促成这场运动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由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的山东决议所激起的爱国热情；另一方面是有一种学习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估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企望。”

不朽的《五四运动史》

《五四运动史》将“五四”运动划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一些新知识分子致力于把他们的思想灌输给中国的学生和青年。后一阶段，以学生为骨干展开了对旧传统和保守主义的全面进攻。”“运动忍气吞声发展超越了纯知识的范围”。

在分析“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时，周先生将中国的学生运动追溯到春秋之际的“子产不毁乡校”。时为公元前542年，即孔子诞生后的第九年。子产为郑相，学生聚集在乡校里肆意抨击政治。有人对子产说：“他们这样放肆，把

学校都封闭了吧！”子产说：“为什么要封校？他们评论政治，认为好的我遵照执行，认为不好的我加以改革。他们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封校？我认为只有效忠国事，尽力做好，才可以减少怨愤，从来没听说过以威吓可以防止怨愤的。”孔子后来听到这件事说：“由此看来，别人说子产不仁，我真的不能相信呀！”尔后，西汉博士弟子王宣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太学生干涉内政的事件”、东汉的“党锢”事件、宋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校的学生领导平民干涉对外政策”等等，以及后来屡屡发生的学生干涉政治的事件，既悲壮又声势浩大。周先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对传统的学术思想提出质疑，要求独立思考，创造新文化，而就彻底性和广泛性而言，“五四”运动是独一无二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代代相承，士大夫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正是中华民族能够屹立的支柱之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承传光大了这一责任感、使命感，而在广度和深度上，又是以往学生运动所远远不及的。

基于以上论点，周先生认为：“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中国知识分

子首次意识到有必要彻底改革中国传统文明”，“对人权和民族独立观念的迅速觉醒”。“促进学生劳工运动的兴起、国民党的改组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它政治和社会团体的诞生。反军阀主义和反帝国主义运动得到发展，一种新的白话文学得以确立……中国的新闻和公众舆论有了长足的进步……加速了旧的家庭制度的衰落和女权运动的兴起……孔教的权威和传统的伦理观念受到根本性的和致命的打击，新的西方思想受到推崇。”

《导言》后分两部分论述：第一部分《五四运动的展开》，包括：一、促成五四运动的力量（1915—1918）：1. 国内爱国者的民族屈辱感（二十一条的影响）；2. 海外留学生的改革热情；二、运动的开始阶段：初期的文学和思想活动（1917—1919）：1. 《新青年》杂志的创办；2. 北京大学的改革；3. 新知识分子的联合和《新潮》杂志的创办；4. 新知识分子的改革观念；5. 反对者的诘难和改革者的辩驳；6. 青年对新骚动的反应；7. 1918年5月的抗日请愿。三、五四事件：1. 中国在凡尔赛和约上的失败；2. 中国公众对和约的反对情绪；3. 幻想破灭的巴黎消息；4. 学生的特

点和组织；5. “五四”示威游行；6. 从东交民巷到曹宅。四、五四事件以后的发展：学生示威和罢课：1. 政府的直接反应；2. 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成立和知识分子的动员；3. 其它城市学生的支持；4. 总统的整纪训令和蔡元培的出走；5. 学生总罢课。五、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工商业者和工人的支持：1. 政府寻求与学生妥协的失败；2. 6月2、3、4日的大规模逮捕；3. 6月5日上海的罢市和罢工；4. 五四事件的解决：内阁倒台和拒签和约；5. 事件解决后政府分裂学生的企图；6. 与事件解决有关的一些问题。六、新文化运动的扩展：1. 新知识分子之间团结的增强；2. 《新青年》和《新潮》令人鼓舞的纲领；3. 新出版物的急剧增加和旧刊物的改革；4. 破坏偶像的热潮；5. 新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组织；6. 新知识分子发起的大众教育运动；7. 对新文化运动不断加强的支持。七、外国人对五四运动的态度：1. 日本的反应；2. 西方人的两种对立态度：同情与疑虑；3. 苏俄的诱惑力。八、思想和政治上的分裂（1920—1922）：1. 分裂所涉及的主要思想派系；2. 问题与主义；3. 社会政治活动论与文化活动论的对立；4. 民主、资本主义、社会



著名美籍华人学者周策纵（左）与本文作者刘作忠

主义和西化;5.参与政治。九、社会政治后果(1920—1922):1. 政治和经济组织重新定向;2. 妇女解放;3. 教育改革;4. 学生运动后来的趋势。

第二部分《主要思潮的分析》,包括:一、文学革命:1. 旧文学;2. 文学作品中现实主义和白话文的提倡;3. 对文学革命的反对;4. 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5.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二、新思想对传统的重估:1. 旧思想的核心;2. 新思想:现实主义、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及达尔文主义;3. 新方法:实用论、怀疑论与未知论的方法及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开始;4. “打倒孔家店”。三、新思想及后来的论争:1. 疑古;2. 民族遗产的重新评价和整理;3. 反宗教运动;4. 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论争;5. 科学与玄学之争。四、结论:对五四运动的各种阐释和评价:1. 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2. 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的批判——中国的一场灾乱;3. 共产党的解释——在列宁的号召下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运动4. 谁领导了五四运动;5. “五四”本质试析;6. 对“五四”功过的再评价;7. 进一步的思考。

书后附录:大事年表(1914—1923);“五四”时期各派社会势力简析;参与“五四”事件的学校和学生人数;参与“五四”事件的大专学校;有关1918—1926年中国工人罢工的一些资料。等等。

“五四”后的几十年中,海内外有关“五四”运动的出版物不少,可惜受政治因素影响,或语焉不详,或曲解史实。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来分析、探讨“五四”运动既深且广的涵盖面,为新文化运动提供了一幅全景的历史画面和透视的焦点,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

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五四”运动,周策纵先生在完成《五四运动史》后,又编辑了一本《五四运动研究资料》,于196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以英文出版。书中详列“五四”时期出版的近千种报刊及其它资料,注明其出版地点、出版日期、编辑人员及撰稿人名单,并包括中文及外文译注。

1978年12月,哈佛大学出版社给

周先生转来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第二夫人桃拉·布莱克·罗素的亲笔信,信中说:

亲爱的周策纵先生: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寄到你处,也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史丹福大学或哈佛大学,或者甚至你是否还活着?但是当我读你的书《五四运动史》时,我就立刻觉得必须写封信,并且设法寄达你,因为我要为你这书而感谢你。如你所知,我于1920年和罗素一同访问中国,事后就和他结了婚。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当时未能知道中国正在进行的活动详情,这些详情你在你书里是那么美妙地叙说了。但我自己也确曾感觉到那个时代的、和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这种精神和气氛似乎穿透了我的皮肤,而且从那时起我就说过,我已从在中国的那一年里吸收到了我的生命哲学。现在读到这全部历史故事,和那些参与者的一生、时代与活动,而一部分参与者,如胡适、梁启超和周恩来等,我又曾亲身会见过,这样读了真使我感觉非常痛快……

我只希望目前英国能有象当年中国青年的年轻一代,希望能有象蔡元培校长等人一样的大学首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学生。最后,我必须恭维你在你的书中所表现的学问和研究。

布莱克女士的这封信确实具有特别的文化与历史意义。1920年10月,应蔡元培和梁启超等人之邀,罗素携带他的情妇,当时正值黛绿年华的布莱克来到中国。在中国10个月的旅行和讲学期间,罗素和布莱克目击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又见到中国人振奋自强的浪潮。后来罗素在回忆录中写道:“西湖的古文明,其绝顶之美,赛过意大利。”“至此我才了解,文明的中国人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人!”“与欧洲相比,我们觉得中国充溢着哲理的、平和的气氛。”“中国应当保存文明和礼貌,坦诚和谦和的脾性,这是中华民族的特质,此外还需加上西方的科学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应用于中国的实际问题。”在中国期间,布莱克怀了孕,回英国不久,两人正式结婚。将近60年过去了,布莱克的中国情丝未断,诚如她自己所说,当时中国青年的精神与气氛似乎穿透了她的皮肤,在中国吸收到她的生命哲学。这确实是布莱克一生最深刻的人生经验。

“她这些话,以这样年迈的西方妇

女改革运动先驱者如此说来,真令人感动。这不但使我个人感到惶恐,它更可能是五四青年一种意外的安慰了。”周策纵先生十分兴奋地说。

由于《五四运动史》采取科学、民主和个人自由自主的立场,不合党派教条,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却被视为“禁书”。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他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两句说“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好一个“浮海著禁书”!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国际气候的不断改变,《五四运动史》终于1979年在台湾公开出版。

改革开放的中国大陆也逐渐认识到:50年代以后,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的中国研究却有了丰硕的成果,以致我们今天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需要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对今天的中国改革来说,首要的依然是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最根本的依然是发展科学,实行民主,这既是改革之本,也是立国之本,其它一切作法都是舍本逐末。没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繁荣富强也是不可能的。标志中华民族新觉醒的“五四”运动,其根本动因就是要在现代世界的竞争中维护我们的独立与生存,就是要革弃旧传统,创造一种新的现代文明以救中国。今天,面临发展生产、科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民主化的严重挑战和选择,我们重温“五四”的历史,就有着特别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研究员周子平、彭吉兴、金来顺、傅维军、万亭等将周策纵先生的《五四运动史》译成中文,于1996年12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译名《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这部饮誉海外多年,史料丰富生动,分析独辟蹊径的经典,终于与“五四”运动的故乡——中国大陆的读者见面。它对今天的改革将有着极大的启发和借鉴价值。

(作者单位:湖北荆州市政协)

责任编辑 徐双明